

## 当鲁滨孙·克罗索遇到西门庆 ——中英第一部小说中的物质利己主义

(美) 马宁 著  
陈毓飞 摘译

小说 (novel) 因其与欧洲后启蒙时代的特定历史、思想以及审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而被认为是属于欧洲的文类 (genre),<sup>1</sup> 在应用于非西方传统的文学研究时, 常被认为只是为散文体虚构故事 (prose fiction) 提供一个方便的标签。但事实上存在多种途径, 能够超越欧洲和北美文学, 有意义且有成效地唤起小说的概念及其历史。在笔者看来, 中国 16 世纪的奇书《金瓶梅》与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的《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 在两方面具有可比性: 一是相似地表现了一种开创性的“现实主义” (realism), 二是由此产生的根植于快速崛起的货币经济所带来思想冲击中的小说叙事传统。这一会聚点有力地证明了瓦特关于小说的社会学起源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 同时中国文学的例子也代表了与《鲁滨孙飘流记》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的教训, 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反驳了瓦特的模式。

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性文类有着独特的概念背景, 17 世纪晚期以来逐步形成了瓦特所系统阐述过的“形式现实主义” (“formal realism”) 的特征。这一文学形式被迈克尔·麦肯 (Michael McKeon) 定性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文类”, 隐藏的假设是: 与小说相关的现代性模式最终是“西方的”, 为“欧洲的崛起”和过去三百年间西方的殖民与后殖民扩张所独具。这种现代性一元发生说如今已受到历史学界的挑战: 16-19 世纪存在一个泛欧亚大陆的“早期现代”世界,<sup>2</sup> 曾被认定是西方现代性起源的经济与社会产物, 事实上能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找到其对应。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 16 世纪的中国, 在经济、社会诸方面与早期现代欧洲存在相似, 社会经济结构在质与量两个层面发生了广泛而彻底的变化。这促使我们超越视“传统”中国为铁板一块的历史单位这种通常理解来进行思考, 并促使我们将 16 世纪作为中国历史一个全新时期的起点重新进行研究。<sup>3</sup>

《金瓶梅》正是出现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时期, 因其独特的主题优势在“四大奇书”中得以凸显, 关注的焦点从英雄故事转移到日常生活, 同时也以一种新闻报道式的叙述风格为特色, 精心描绘人物的环境与经历的细节。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已认识到的跨文化会聚点的共同经济基础, 超越了狭隘的文学分类问题, 指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重要跨文化研究: 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交集。在下面《金瓶梅》与《鲁滨孙飘流记》的比较中, 笔者研究的正是这一更大的动态。具体说来, 瓦特提出经济个人主义 (economic individualism), 并认为这是《鲁滨孙飘流记》的核心问题; 笔者的阅读正是集中于两部小说对这一主题的相反处理。瓦特用这一术语含蓄地认同了笛福叙事中视鲁滨孙追求财富为具有“进步性”这一思想前提, 但这一资本主义信条在《金瓶梅》中遇到了完全的

<sup>1</sup> Fernando Cabo Aseguinolaza, “Dead, or a Picture of Good Health? Comparatism, Europe, and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8.4 (2006): 427.

<sup>2</sup> 参看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2000) 和 Andre G.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8)。

<sup>3</sup> 参看 Evelyn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et al.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5), 3-33.